

辑著《世说新语》“三汇本”感言

周兴陆

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评方式,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语,实际上是一言中的;有些评点近乎文本细读,如清初吴淇的《六朝选诗定论》,对诗歌分析之细致透辟,今人也难以企及。可惜,评点这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术范式里被排斥,受冷落,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我辑注的《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》,作为黄霖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文学名著丛刊》之一种,最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。整理过程中有一些感想,现在写出来,做一个总的交代。

为什么以袁褰嘉趣堂刻本为底本

唐人所抄《世说新语》今仅存残卷,传世的《世说新语》是在宋代定型的。宋代《世说新语》的版本有三个系统:

1、现存最早的是宋高宗绍兴八年(1138)董弅刻本(下简称“董刻本”),大约在南宋后期传入日本,先藏于金泽文库,后为前田氏“尊经阁”收藏,1929 年日本尊经阁从刊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,1956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新影印,才得以广泛流传。

← (上接 9 版)

英法之游。

1946年2月,杨联陞上交了以《晋书·食货志译注》(*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*)为题的博士论文,获得历史系和远东系合授的博士学位。那时柯立夫也已从中国服兵役回来,于是他俩又能经常见面叙旧、聊天和切磋学问。杨联陞对这段时间的交往时有记录。比如,1946年10月21日,他下午找柯立夫略讲中亚、北亚民族,谈及女真语,说自己“颇有意一研女真小字”。晚上又请柯立夫来家吃晚饭,之后还忘不了到贾府去看望贾德纳,和他闲谈。期间,柯立夫还自愿教杨联陞蒙古语。杨联陞毕业后,柯立夫最先告诉他哈佛燕京学社有意聘请他留校。虽然那段时间杨联陞对留校任教并不十分感兴趣,但他还是不时通过柯立夫了解这一教职的细节。

当哈佛大学远东系决定正式聘任他时,杨联陞对去留是有过犹豫的。1946年秋,纽约的联合国机构需要聘任语文研究员一名,当时杨联陞已到了旧

2、宋孝宗淳熙十五年(1188)陆游刊本,原刻本已不可见,明代袁褰嘉趣堂仿宋重雕本,保存其旧。后世多有翻刻。

3、清初徐乾学传是楼原藏宋淳熙十六年(1189)湘中刻本,然原本已不可见,今传有雍正八年(1730)沈宝砚校记,附录于四部丛刊影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之后。

实际上只有董刻本和基于陆游刻本的嘉趣堂本这两种宋本流传下来。蒋凡老师曾编撰《全评新注世说新语》,以董刻本为底本校以通行本,很有文献价值。但因为明清时期国内通行的是袁褰嘉趣堂本系统,许多校勘、注释和评点都是依据此本。现在作“三汇”工作,如果转而采用董刻本,必然造成大量的异文现象,而且许多注评就显得无的放矢了,因此,我依然采用嘉趣堂本为底本。举

一个例子来说,《言语》第 94 则刘孝标注引张资《凉州记》曰:“天锡,字公纯嘏。”王世懋批曰:“世乃有三字字,不可晓。后过江,为人所笑,乃减一字。”意思是说,通常人取字是两个字,张天锡字“公纯嘏”,乃三个字,东晋后被人笑话,就减去一字,字“纯嘏”了。董刻本原文就作“天锡,字纯嘏”,如果以董刻本为底本汇录批语,王世懋的批语就不可理解了。

元代刘应登删注、补刻刘辰翁评点本的价值

这是近几年新发现的一个元刻本。

刘应登删注所依据的本子是董刻本,但他“精划其长注”,对刘孝标的注释作了大量的删

削,本身没有多少校勘的意义,它的意义在“间疏其滞义”,刘应登的注释,多有参考价值。

如《纰漏》第 5 则“谢虎子上屋熏鼠”,刘孝标注:“中郎,据也。章仲反。”“章仲反”三字是什么意思?后人不理解,就妄为改字,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所依据的晚清纷欣阁本改作“章仲反”,其实也是不通的。朱铸禹本作“章仲友”,连下“按”字,竟然变成一个人名了。刘应登注很清楚:“中,章仲反,次也。”原来“章仲反”三字是反切法注释“中”字,问题迎刃而解。

又如《政事》第 16 则“陶公性检厉”载一事:“尝发所在竹篙,有一官长连根取之,仍当足,乃超两阶用之。”取竹连根,“当足”是什么意思?刘应登注曰:“谓就连竹根以为篙以代铁足。”竹根坚硬耐磨,用以为竹篙的探入水底的铁足。解释得非常确切,刘辰翁称赞说:“非

此解,殆不喻。”

当然刘应登注释也存在讹误。如《德行》第 37 则:“晋简文为抚军时,所坐床上,尘不听拂,见鼠行迹,视以为佳。有参军见鼠白日行,以手板批杀之,抚军意色不说,门下起弹。教曰:‘鼠被害,尚不能忘怀,今复以鼠损人,无乃不可乎?’”门下起弹的“弹”作何解?刘应登注曰:“谓恐因弹鼠而误发伤人。”把“弹”解释为投鼠忌器的“投”字,门下起弹,谓手下人要打杀老鼠,但老鼠明明已被参军用手板批杀了,何来“弹鼠”?因此刘辰翁批评曰:“解误,可笑。”后来刘继增按曰:“此‘弹’字,非‘弹射’之弹,当作‘纠劾’解。”最为明白。门下起弹,是指门下要纠劾以手板批杀老鼠的参军。

刘辰翁是第一个致力于评

(下转 11 版) ➡

金山,正准备回国任教,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先接受这一机会,但是半年后,他觉得联合国的这一工作甚无聊,思前想后,还是决定回到教职为好,才开始认真考虑哈佛大学的聘任。和柯立夫顺畅当留留在哈佛大学远东系,一心一意担任教职的学术之途不同,杨联陞当时面临几个选择,一下子拿不定主意。叶理绥希望留他在远东系任教,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也表示支持,但是他自己对留校任教没有十分的兴趣,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家眷(太太和两个女儿)还在国内,而且原本和胡适说定,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北大任教。此外,1946年初,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和张其昀(晓峰)也有意聘他去浙大任教。

1947年初,杨联陞就自己何去何从一事悉心征求胡适的意见。他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并没有马上答应哈佛远东系的聘任邀请,而且和胡适坦陈权衡去留哈佛的利弊,且在信中特意跟胡适介绍学友柯立夫。他写道:“(同事雷夏[Edwin O. Reischauer,后来常作“赖世和”])柯立夫史学都有根柢,也

肯用功。柯君之于蒙古学,将来有承继伯希和之望,我也想跟他弄一点这方面的东西。”正当杨联陞犹豫不决,又不得不作出决定时,胡适发来电报。杨联陞在日记中详细记着:“(1947年3月5日)下午四时半得胡先生电报,只有简短三个字:Advise accepting Harvard(建议接受哈佛一职)。”这一电报来得正是时候,帮杨联陞一锤定音。此外胡适还给他吃了定心丸,说是往后他任何时候想回北大,都没问题。为此,杨联陞在1947年3月5日回信感谢胡适说:“等我回国时,北大仍旧要我。您对我实在太好了!”

相比之下,贾德纳的学术之途就没有这两位后生来得顺利。当年在北平,是他介绍柯立夫和杨联陞相识,并且帮杨联陞走上西方汉学之通衢,可是他自己1939年末在北平进修两年回到哈佛后的教职反而一筹莫展。虽然他历来精于目录学,早在1937年就出版了《中国旧史学》(*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*)。此书绝版后在1966年由杨联陞作序再版。根据杨联陞介绍,贾德纳“除了对西洋汉学著作如数家珍之外,

对中国日本学人的造诣,也颇了解”,但是他的博士论文《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》因“叙论太长,牵涉太广,修改不易”,未得出版,因此他受聘于哈佛燕京学社的助理教授一职并未顺利得到晋升。他的受聘任期到1940年9月即止,不过学社把他的任期延长了一年,当作带薪的一年学术假。因此,到了1941年秋天,贾德纳只得离开哈佛燕京学社和远东系。杨联陞回忆恩师贾公时满怀憾意:“我做研究生时他帮我英文,帮我法文,不知道费了他多少时间。可惜他太不自私,而且对自己的著作,定的标准太高。差一点的不肯随便发表,这样把自己在哈佛的终身职的机会错过了。”贾德纳后来四处求职,接受短期聘任,在好几所大学任教,“终不十分得意”。1944年前后,贾德纳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年,后来杨联陞在1947年给胡适的信中也提及:“贾(德纳)今年在耶鲁教目录学及远东文化史,聘期只是一年。这位先生外交是吃亏点,学问实在不错。”贾德纳1960年在康桥家中过世,他的个人藏书第二年全都捐给了布朗大学(贾德纳

之子在此任教),成为布朗大学图书馆内有关东亚研究的一批最重要的藏书。

自从认识贾德纳以来,杨联陞和他相处一直亲如家人。对杨联陞和柯立夫两人而言,贾德纳不仅是他们学业和学友之谊的桥梁和恩人,而且也是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。作为哈佛最早以欧洲汉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史学史教研的美国学者,贾德纳提携杨联陞步入西方汉学界,使得当年自己的研究助理成为美国汉学界独当一面的大学者。正如杨联陞说的,如果没有贾德纳,他都不知道“自己现在身归何处”!

(作者为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)

